

访谈录

◀ (上接 3 版)

成为摄影者生涯中的一系列坐标,成为我们去分析他的生涯、他的风格的重要途径。

文汇报:您说“这些信息和这些底片交汇,会产生非常大的能量”,我想应该有好几个层次,如对正史细节的补充、对这些底片的再认识等等,可否给我们说说一些具体的例子?

高初:在档案工作中能格外体会到民间摄影档案的重要性。仅仅拿抗战时期的摄影举例:新四军的档案在皖南事变之后大都毁掉了,来自叶挺和张爱萍家中的档案的整理成为了新四军视觉档案的关键性补充。我们完整地整理了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 40 年的童小鹏先生的档案,成为了抗战时期长江局和南方局的重要摄影资料。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需要面对两类前辈档案工作者和学者不在意的题材:藉由战争时期的日常生活和日常风景而指向革命的内在性(革命史研究指向);藉由一个摄影师生涯中那些过去从未被提起的那些一次次不知名的小战斗的组图,讨论他的生涯和风格(艺术史研究指向)。这些档案并不容易使用;甚至可以说,我们面对的是自战争时期就未很好整理的混乱的档案。战争时期摄影资料的整理者,一般只对于党史、军史所选用

的历史题材的照片有所整理、考证。

使用这一类底片的难度是很大的。战争时期的档案随着整理,有不同的底片编号,但这些底片长期没有整理和使用,哪个编号的底片才能调阅,我们需要通过试错的方式,记录每一次调阅信息。而且这类图片的印相信息也有很大的问题:在我们的工作经验里,无论拍摄者的署名还是文字信息,大约有五分之一的错误。而拿着这些图像去采访这些图像的拍摄者,是其中最高效的考证方式;当时的画报也提供了作证。因为战争时期的困难条件,底片的冲洗在一段时期是风格化的,于是观察底片能够成为考证摄影者的有效手段。另外,前线的摄影者往往跟随特定的部队,而部队的行军路线和战斗情况,我们往往能在军史,尤其是后勤史中查询到,而且我们也会采访部队的战士,得到一些佐证。

把摄影史的作品性和“燃起一股热力”的心理动能结合

文汇报:我们知道,SACP 自成立之初就明确了三个研究方向——“关于中国的影像”“中国摄影史”和“中国革命的视觉档案”。从你们搜集

的材料来说,三者会有重合,那么其中层次是怎样的?这三年来,这些研究方向各自有怎样的发展?

高初:“关于中国的影像”,我们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更多借助西方的理论,把视觉材料变成文化史、社会史、城市史的新材料。“中国摄影史”则更多是从历史学到对艺术史的拓展、对革命史的丰富,以及以生命史为贯穿。“中国革命的视觉档案”,其实不但包括这一部分,甚至是以这些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为线索,把这个视野拓展为一种世界史角度的观察。

我先讲讲相关档案的情况。晚清民初的中国影像大多在欧洲,之前在英法有五个学校联合办了一个项目,共同处理包括明信片、铜版画和摄影在内的视觉材料。包括赫德档案在内的大量海关档案保存在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除此以外,波士顿很多华人家族的图像档案后来都捐给了美国迪美美术馆。

民国时期的一部分影像被带到了台湾,但我们觉得这部分档案最开放、其实也相对完整的,是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和其他一些大学档案馆里。还有一些早期来华的记者的照片,散落在包括哈佛燕京图书馆、胡佛档案馆在内的档案馆里。这些博物馆和学校其实非常热切地想

(下转 5 版) ➡



1940 年,冬北岳区反扫荡战斗。沙飞 摄



河北张家口,军调部三人小组在张家口停留后继续飞往大同视察,图中摄影师为沙飞。石少华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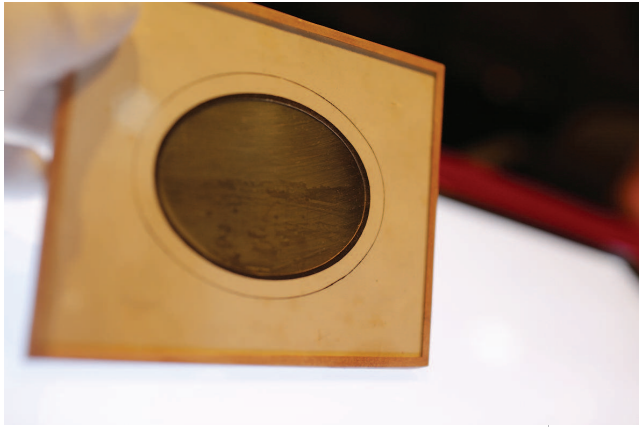


1943 年,吴印咸正在为毛泽东拍照



1948 年,临汾战役,我军爆破手进行连续爆破。高帆 摄

► “早期中国影像”数字工作计划。图为存于香港历史博物馆的 1844 年于勒·埃及尔拍摄的银版作品《澳门南湾》,被认为是迄今发现的留存最早的一批关于中国的摄影作品。



◀ 莫斯科国家与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图像档案